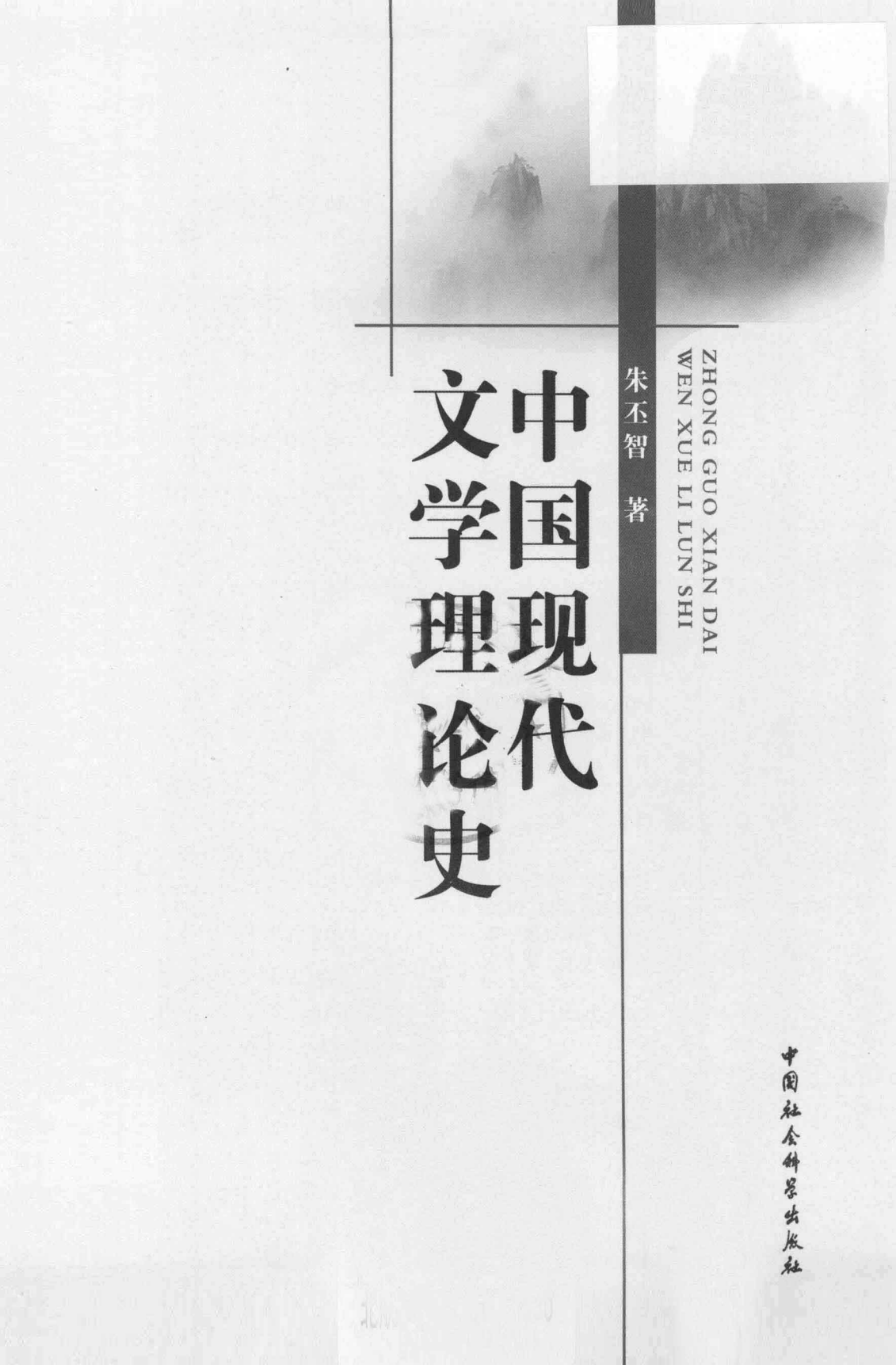


ZHONG GUO XIAN DAI
WEN XUE LI LUN SHI

朱丕智 著

中国现代 文学理论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现代 文学理论史

朱丕智 著

ZHONG GUO XIAN DAI
WEN XUE LI LUN SHI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史/朱丕智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11

ISBN 978-7-5161-3174-9

I. ①中… II. ①朱…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文学理论—
文学史 IV. ①I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07750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晓鸿

特约编辑 王冬梅

责任校对 韩海超

责任印制 曹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268 号(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5.5

插 页 2

字 数 209 千字

定 价 4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导论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史认识的几个基本问题	(1)
-------------------------------	-----

上卷 文学革命时期(1917—1927)

第一章 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产生	(15)
第一节 文学革命爆发与其理论产生的社会时代原因	(15)
第二节 新文化运动与新文学运动	(23)
第三节 中国古典文论的终结与现代文论的兴起	(29)
第二章 文学革命时期的三大文学观	(45)
第一节 文学革命的理论基石:进化论文学观	(46)
第二节 语言形式的革命:白话文学观	(58)
第三节 思想内容的革命:“人的文学”观	(67)
第三章 文学革命时期的三大主义	(76)
第一节 三大主义概论	(76)
第二节 文学革命时期的现实主义	(87)
第三节 文学革命时期的浪漫主义	(93)
第四节 文学革命时期的现代主义	(105)
第四章 文学革命时期的文学批评	(115)
第一节 文学批评性质与方式的转换	(115)

第二节 文学批评思想观念的变革	(121)
-----------------------	-------

中卷 左翼文学运动时期(1927—1937)

第五章 阶级论文学观的确立:“革命文学”论争	(129)
------------------------------	-------

第一节 革命文学论争(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产生之社会 时代缘由	(129)
---	-------

第二节 革命文学论争之理论主旨	(136)
-----------------------	-------

第六章 左翼时期的革命现实主义理论	(145)
-------------------------	-------

第一节 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	(146)
----------------------	-------

第二节 革命现实主义理论的创建	(153)
-----------------------	-------

第七章 阶级性文学理论的调适:“两个口号”论争	(167)
-------------------------------	-------

第一节 “两个口号”之提出与论争	(167)
------------------------	-------

第二节 民族性与阶级论文学观的融合	(173)
-------------------------	-------

下卷 抗战及解放战争时期(1937—1949)

第八章 抗战时期文学观念的变化	(183)
-----------------------	-------

第一节 抗战爆发与民族文学观的确立	(183)
-------------------------	-------

第二节 社会功能和创作方向的变移和强化	(192)
---------------------------	-------

第九章 阶级性文学理论的体制化政策化:延安文艺整风	
---------------------------	--

与《讲话》	(200)
-------------	-------

第一节 体制化——延安文艺整风	(200)
-----------------------	-------

第二节 《讲话》的政策性质和经典地位	(207)
--------------------------	-------

第十章 革命现实主义理论体系的莫立	(211)
-------------------------	-------

第一节 革命现实主义理论之发展态势	(211)
-------------------------	-------

第二节 革命现实主义理论之体系构成	(220)
第三节 革命现实主义理论之特质解析	(229)
结语 中国现代文学理论之发展特点	(234)
后记	(238)

导论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史 认识的几个基本问题

中国现代文学理论以 1917 年爆发的文学革命为标志而兴起，直至新中国的成立方宣告结束。短短三十余年间，伴随着中国急剧动荡的社会政治情势，中国现代文学理论一波三折，经历了曲折复杂的演变历程。由此开端，中国的文学理论建设挣脱了古典文学理论几千年来的沉重桎梏，破旧立新，不断演进，从一种经验形态的形象化理论走向了思辨形态的理论化道路。这是中国文学理论发展历史上一个重要而伟大的转折点，值得学界人士花大力气去探讨、阐释。

如何认识、评说这段文学理论史，换言之，如何去研究它，必须首先解决好三方面的基本问题。首先，需要廓清的是我们头脑中的文学历史观，即怎样来看待这段“历史”。不同的立场和观念带来的将是不同的认识结果。其次，必须确立相应的文学理论史的研究方法和评价标准。因为作为艺术的思想精神的理论史的方法和标准，显然与其他理论的历史的东西存在较大的差异和区别，有其自身的独特性。再次，还要明确文学理论史的分期观念及划分，以锁定研究对象。事实上，怎样确认一段文学理论历史的起止及其内部阶段性的划分，乃是由我们对理论发展基本性质的整体把握和历史阶段性变化的认识来决定的。而以什么样的观念来进行分期，实际上已在很大程度上规限了文学理论史的研究路向和史著的理论水平与价

值，容不得半点马虎。这几个方面的问题，应该说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史最重要最基本的前提，也可称之为文学理论史研究的基石。对此，欲治文学理论史者，不管你是否明确意识到，事实上都会作出相应的回答。

一 文学理论史的现象描述与史的构建

历史是什么？换句话说，怎样去研究历史？人们对此所作出的回答，表明的就是如何看待历史的观念。其实，不管是研究一般的社会历史，还是特殊的文学和理论历史，历来有两种基本的观点和思路。一是追求历史的真实——事实的、现象的追寻和陈述。即用学术性的眼光竭力去整理、证实、发现、挖掘那些已经发生或被时间尘埃淹没而尚未被人们所知晓的事实、材料，以恢复原生性的历史形貌。如《史记》和诸多历史记事之类的史著，可视为典型代表。文学史方面，我国的文学大事记和作家作品为主要线索的著作，大致亦可归于此类。二是追求历史本质的内在真实，或者说在诸多繁杂历史现象背后的东西。即通过自己的主观认识，拨云驱雾般地去选择、梳理、整合这些材料，从中提取出某些普遍性的共质以及带有规律性的概念范畴，进而揭示隐藏在历史表象深处的历史真面目。一般性社会历史的研究方面，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以文明观念来阐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巨著《历史研究》可称典范。而在美学和文艺理论方面，黑格尔的《美学》则以概念化的方式，勾勒了西方两千余年美学和文艺理论思想发展的历史。恩格斯在 1891 年 11 月写信给康·斯米特说：“由于黑格尔的每一个范畴都是哲学史上的一个阶段（他在多数情况下也指出这种阶段），所以您最好把《哲学史讲演录》（最天才的著作之一）作一比较。建议您读一读《美学》，作为消遣。只要您稍微读进去，就会赞叹不已。”^① 足见恩格

^①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494 页。

斯对这种方式的赞同。

依笔者看来,这两种观点和思路并无必然的冲突,分属两种追求层次、目的均不同的历史观,无须偏执一端而非难对方。但必须明确,前者注重事实本身,进行的是一种尽量客观的陈述;而后者则着重于现象所显露的本质,表达的是一种主观的认识和评价。当然,站在理论性的立场,欲对历史进行某种解说,则非后者莫属。

实际上,在历史著述中,绝对的客观和绝对的主观都是不存在的。客观之中有主观,即使是材料的选择整合,也会透露出作者的某种主观意图;而主观亦不可能脱离客观,它必须建立在客观基础之上,若缺乏历史事实,再精妙的评说都将失去其存在的理由。这是任何史著都摆脱不掉的主客关系,也是我们对历史研究所应持的一种基本态度。只不过在具体的史著中,孰重孰轻,客观抑或主观占有多大的比重,乃是因作者自身观念之不同而进行抉择的结果,并由此而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史著形态。至于站在何种立场上去解说历史,乃是由不同世界观所决定的,而非历史研究的路向问题,无须在此赘说。

在此,我们同样面临着一个选择:是对中国文学理论史进行一种现象的事实描述,还是通过自己的理论思索去进行一种史的建构。立足于前者,我们只需将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史上的重大事件、文学思潮、理论论争,以及著名理论家、批评家的理论观念、批评思想等,逐年逐月按大致的时间顺序罗列出来,其间再配合一些重大社会历史事件的勾连,略加一些评说即可。立足于后者,显然就要多花费力气了。我们的回答当然是后者。

文学理论本身就是种特殊的精神现象,而要对这种精神现象进行史的阐释、评价,不是简单地将这些理论现象、批评现象原生态地予以展示就能够做到的,需要的是超越这些个别理论现象、批评现象,立足于全面的普遍性的文学理论立场,去揭示隐于其中的整体性的特质或某种规律性的东西,以及文学观念、理论概

念范畴的内涵如何产生、演变、发展的内在逻辑联系，和文学理论何以如此演化的与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等之间的关系和原因。这样一来，各种理论现象、批评现象，以及诸多理论家、批评家的文学思想和观念，就不再是以单独的身份出现，好似某种孤立的存在，而是成为该部文学理论史网络上相互联系的某个环节。也就是说，在史的构架中，论述是在一般的抽象的层次上展开的，即使其间出现某些特定文学理论现象、事件或专人的内容，那也是从理论史的整体视角和史的演进链条上来予以考虑的，而并非对其问题本身的单纯考量。如此，我们才能真正站在史的平台上去把握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史中文艺思潮的更替、理论概念的演变、批评观念的转换等，且从中探究出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发展的规律和特点，进而形成一个系统性的对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史的总体认识。

二 理论的历史的研究方法与评价标准

毫无疑问，历史唯物主义既是我们研究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立场和观点，也是研究方法。这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史的研究来说，亦同样如此。但是，就这门具体学科而言，如何真正落实、贯彻好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怎样处理好文学理论史这种艺术性门类的精神现象的特殊性，并使这几方面有机地融合起来，显然需要作一番深入细致的思考，提出一个可供操作的具体的研究方法。在这里，认识角度的方法和评价角度的标准是紧密联系在一起，二者关系的转换只是立足点的不同，前者是从认识的立场、方式来考究的，后者则循此来评判理论立场、方法的偏正和结果的理论吻合度及正误，故综而述之。

概括而言，我们提出的是理论的历史的研究方法与评价标准。即站在人类的社会的以文学为本位的整体性艺术理论立场，去探究普遍性理论与历史阶段性理论之间共时与历时、静态与动态的辩证

结构关系，同时充分考虑社会诸因素对文学理论的一般影响和历史影响，把理论的和历史的东西有机融合在一起的研究方法与评价标准。为论述之便，我们将两者分而论之，以显示其不同的特质和侧重点。

先谈理论的研究方法与评价标准。

从共时性的向度上去审视文学理论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这一艺术理论涵括了许多超越时代的共同的基本性质的东西，文学与社会诸因素的关系也是在最普遍的层面上去把握的。概言之，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那些本质性的规定及文学所具有的诸多功能、属性等，是贯穿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学之中的。哪怕是在文学的原初时期，许多功能、属性的东西也是潜在地隐于其间的，只是由于历史的或认识的局限，这些基本性的东西是逐渐显露出来的，但这并不代表其本身不存在。犹如人的DNA一样，这些基本性质的东西乃是文学之为文学的身份标志——基因遗传谱系。因此，对于文学及其理论自身特性的一般认识，不仅是我们的研究任务之一，同时也是我们赖以观照、评价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学理论的一个标尺。此为文学理论顶级层面的基本规定，亦即其静态结构，不可逾越和违背。这就意味着，当我们形成了一般文学理论之基本性质的认识之后，其理论的阈限也就同时诞生。应该认识到，任何事物都是有其有效的活动范围的，越过这一范围，理论的合理性必然遭到质疑。同样不可否认的是，每一时期的文学与文学理论总是以其具体的历史形态展现出来的，而文学思想、观念、概念的内涵也因社会时代的需要而变化或突出、强化文学的某些特性甚至压抑、排斥某些基本属性的东西。这便像一个旋转运动着的多面体，有时去突出某一或某几个边角一样，只要其主张不越界，亦可在一定合理范围内来给予认识、评价。但是，无论任何时期的文学理论，也不管其如何伸缩延展，总不能突破作为一种艺术的文学理论的基本规定性，否则，就是非文学理论的。举个极端例子。如左联时期，出于政治宣传和

文学大众化的考虑，有人提倡“五百四十二万遍通俗”、“通俗到不成文艺都可以”的创作观，^①心愿虽可理解，但说法显然失之偏激。这就突破了文学之为文学的疆界，可以从文学理论本性上给予否弃。

很明显，我们所说的理论的方法，并不是要倡导什么纯理论，也不是要以一个什么僵硬的理论标准来规范某一历史时期的文学理论，只是强调以一种理论性的眼光来审视某一特定的文学理论是否有悖于艺术理论本身的特性及其在理论性上的合理程度。需要提醒的是，理论性眼光作为一种研究方法与评价标准，并不肯定代表结果的正误，它更准确的意义是将我们引向一个正确的认识、评价方向。其间起着关键性、决定性作用的东西，是我们对于共时性的文学理论把握的精准度、深广度，以及理论的历史特性的准确捕捉。只有在此基础上的全面而完整的正确认识，才会使理论的方法与标准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学理论研究中游刃有余地得到令人满意的发挥。还应说明，理论的方法与标准就其本性而言，仍然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只不过这一研究对象的范围，从其长度来看是一个无须分割且不断延长的历史，它体现的乃是文学理论历史的一种共性。当我们从历时性的向度上去审视文学理论并落实到某一具体历史时期时，它所显露的便是文学理论史的某种个性。就其历史性的表现来说，人们更易于认识其历史唯物主义的性质罢了。于是又可以说，理论的方法与标准就是站在共性的立场上去审视、观照、评说个性的表现。

再说历史的研究方法与评价标准。

在本来的意义上，“历史的”称谓不过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别称。于此为了有别于重在一般性理论的方法与标准，同时也为了突出其在研究方法和评价上侧重于时代个性和社会因素的特点，故而名之。

历史的方法与标准可从下述两方面来理解。

一是从文学理论自身的历史来看，它有着相对独立的发展道路，

^① 郭沫若：《新兴大众文艺的认识》，《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第二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而其发展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变化、演进的历史。其要义有三：其一，文学理论的思想、观念、概念等是相伴于文学作品的产生而产生的。作为一种精神现象，一种理性认识的成果，文学理论不可能在文学诞生之际便一蹴而就，齐刷刷地裸露于世。它既受到社会历史及文学发展对它的制约，同时又局限于每一时期人们的认识水平，于是，这些文学理论的思想、观念、概念就会以其各具特色的复杂的历史形态呈现在我们眼前。如果缺乏历史的透视力，就难以发现其内在的纵横交错的诸多联系，将之有机地链接在一起。其二，理论与创作虽是对相伴而行的孪生兄弟，但撇开发生学的意义而言，二者又是滚动发展的。因此，文学理论既需随时捕捉、总结文学发展的新动向，又要有预测、前瞻的超前性。其三，历史性的文学理论中蕴涵着文学理论一般性、普遍性的质素，是一座有待并需要开采、冶炼的丰富矿藏，论者们亦不可不察。由此足见，理论的创新性成果作为某一特定时期的产物，不能没有历史的关注。历史的标尺作用在于，对某文学理论在历史演进途中的成败得失、意义价值等，都需要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给予科学的合理的理论评说，赋予其一个确切的历史上的理论地位。

二是从文学理论与社会历史的关系来说，一方面，文学及其理论是社会的历史的产物，必然受到社会诸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文学及其理论一经产生，又有其自身的特质、规定性和发展逻辑，对社会诸因素的影响有选择的权利和内化的过程，并非简单的加法关系。这不仅显示出某历史阶段的文学理论的社会时代性，更重要的是体现出二者互相影响、制约的辩证运动关系。我们知道，一方面，过度强调社会历史政治对文学理论的决定性影响是毫不可取的，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否认，注重文学内部规律研究的观点是令人欣赏的，学界不少人高举起重视艺术研究的旗帜亦是非常漂亮的动作，但这并不等于要抹去文学理论与社会的外部联系。我们不主张以庸俗社会学，尤其是唯阶级唯政治的观点和方法去简单看待文学及其

理论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放弃更具包容性、更有弹性空间和说服力的社会历史的研究方法和评价标准。应该说，社会历史的方法与标准是诠释文学理论何以产生及如何演进的一个有力武器。道理很简单，因为任何文学思潮、文学观念、理论概念、批评思想以及审美风尚、情趣等，都不可能完全独立于社会历史之外去发展，它们必然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想当年，文学研究会顺应当时反帝反封建的社会潮流，义无反顾地在文坛上高举起“为社会、为人生”的大旗之时，曾理直气壮地大声宣告：“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①而今，当我们生活在社会政治经济科学文化飞速发展的21世纪之时，“游戏”、“消遣”之类的娱乐性功能早就又悄然回来了，实际上已成为一种社会大众的主流意识，其存在的合理性也不再遭到非难。毫无疑问，文研会的功利性主张和现在的非功利性现象，背后都隐藏着深刻的社会时代因素，如果脱离历史，我们就会远离阐释这些理论问题的立足点和视角，也难以对其作出准确的评价。在这里，历史的方法和评价标准显然大有用武之地。需注意的是，我们在寻找文学理论与社会历史二者之间的联系时，必须尽量做到下述几点：一是要找准后者作用于前者的连接点，真正能够说明二者的因果联系，进行有效阐释，而不是简单地冠以一个笼而统之的时代背景就草草了事；二是要充分认识到后者对前者的影响不是社会诸因素都等同作用的，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各种社会因素所起的影响作用是有差异的、有主有次的，应根据具体情况区别对待；三是社会诸因素对文学理论的影响不是直线式的，其作用方式复杂、曲折、多样，同时，它还需要经过文学内部机制的吸收、消化、转换，才能得到恰如其分的表现。

可见，理论的研究方法与评价标准中有历史，历史的研究方法

^① 文学研究会：《文学研究会宣言》，《文学运动史料选》第一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

与评价标准中有理论，理论的历史的研究方法和评价标准是一个辩证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只有将它们灵活自如地综合运用，我们对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史的认识、评价，才可能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准。至少，不至于产生研究方法和评价标准上的偏离，造成顾此失彼的混乱状况。

三 文学理论史的分期观念和划分

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史的阶段性划分，首先应解决的是分期的观念问题。

20 世纪末，出于对以社会政治事件来进行文学分期的反拨，有人倡导重建文学史，也有不少人提出应按照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来分期，这些都是很好的意见，值得人们去思索。我们认为，以前单纯以社会政治事件来划分文学理论的历史，把文学理论视为附庸，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文学理论史就是文学理论的历史，当然应以文学理论为主体，从其自身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上来考虑分期的划分。在这样的主基调之下，纳入社会历史因素作为参考，也是很有必要的。因为社会历史因素特别是重大的社会政治变动对于文学理论的变化和发展，有着非常明显的影响作用，二者关系甚为密切。这种现象，至少可以说在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史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就此而言，对于分期时间的认定，二者既可能同步，亦可能有所错落。但不管怎样认定，已无碍我们作出如下的基本判识：主次地位确立之后，认识的出发点和归宿都特定地落在了文学理论自身之整体性质的变化之上，社会历史因素至多只能是作为一种时间性的标志和阐释性的内容进入某个特定的文学理论发展阶段。归根到底，文学理论史阶段之划分的核心问题，不在于确定了怎样一些时间段，时间不过是种标志性的东西，只有当我们赋予它实质性内容的时候，它才会具有真正的意义。关键在于，我们到底是站在什么样的理论立场上去阐释这些时间段以及此时段内文学理论发展的整体状况、

性质、特征，若干阶段之间的相互联系等。若能对此作出令人信服的合乎逻辑的论述和说明，那么我们就可以承认这种分期是有道理的。正因为此，只要是站在不同文学理论角度对文学理论史的分期，虽然不尽相同，也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即使分期相同，亦可能会表现出不同的阐释内容。所以，但凡是站在文学理论立场上进行的分期，多多少少都会丰富我们对文学理论史的认识，不必唯我独好，排斥其他。对此，我们应持一种宽容的理论态度，欢迎分期的多样化。不过，我们不得不提醒的是，当下学界出现了一股为创新而创新的庸俗之风，诸如到清末民初里去搜寻新文学的蛛丝马迹，以此作为现代文学和理论史的开端，把眼光死盯在细枝末节的某一点上，忘记了史的划分是在整体质的原则上来确认的；还有热闹非凡的一系列以 20 世纪命名的文学史，既无如此划分的理论立足基点和文学根据，亦无向上下各个世纪延伸的理论的文学的逻辑，造成不少纷扰和矛盾，亦不可取。对此，我们必须注意到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史作为历史方面的一部专门性的断代史（实即民国时期的文学理论史），其发展有一个突出而鲜明的特点：即文学理论史与社会历史是紧相结合在一起，几乎是同步发展的，二者的纠缠也就成为一种必然。加之在这样一个充满激烈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的特殊历史阶段，社会政治因素是那样强烈而显著地作用于人们的文学思想观念，以致社会历史运转过程的阶段性与文学理论发展的阶段性呈现出惊人的相似，二者历史分期的类同或一致，当在情理之中。要旨在于，我们的阐释要立足于文学理论自身。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将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史的起止点和内中几个阶段作如下划分，并对其基本的理论状况作扼要的解说。

我们认为，现代文学理论史的起点在 1917 年的文学革命，终点在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之前或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召开之前。起点理由：从文学理论整体的质的认定及全面（等同于全国）的影响来看，1917 年胡适、陈独秀的发难文章揭开了文学革命的序幕，引爆了整

个中国文学理论根本性的变革，在理论形态和思想性质上开始发生质的变化。终点理由：从理论的总体态势和地位来看，在新中国成立之前，虽然阶级化、政治化的革命现实主义理论据有理论的主流地位，但它毕竟只是一种党派的、流派的性质，未能真正统领全国范围里时强时弱的多元化理论格局。新中国成立后就大不相同了，借助国家政权的权威，革命现实主义理论排斥、打倒其他一切异己理论，形成一统江山，并将自己自行提升为具有普遍性意义的文学理论，整个理论状况发生了截然不同的改变。

根据现代文学理论史的发展历程，可将之划分为互有关联又大有区别的三个阶段。

其一，文学革命时期（1917—1927）。这是中国现代文学理论之崛起及草创阶段。各种文艺思潮、主义及理论观念交相激荡，破旧立新，汇成了一股冲决中国封建文学和理论的强大力量。理论形态由经验性、形象化的古典文论走向思辨性、概念化的理论道路，思想性质则为反封建的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进化论文学观，呈现出兼容并包的多元化理论格局。此阶段后期，文学革命阵营的分化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理论的萌芽，将文学理论的发展引向了一个新的方向。

其二，左翼文学运动时期（1927—1937）。这是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转型期。以“革命文学论争”为标志，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发展的主流转往无产阶级方向，阶级论、政治性的革命文学理论由此诞生，并与现实主义文学模式结合在一起，排斥其他主义的文学模式，初步创建起革命现实主义理论，占据着文学理论的主流和独尊地位。

其三，抗战及解放战争时期（1937—1949）。这是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演变颇为复杂且进一步成熟的特殊历史阶段。抗战爆发，民族文学观应运而生，占据了全国性的文学理论的主导地位，并与延安根据地先退隐后又重新抬头的阶级论文学观交错并行；抗战结束后，阶级论文学观又重新占据了文学理论的主流和独尊地位。所言成熟，